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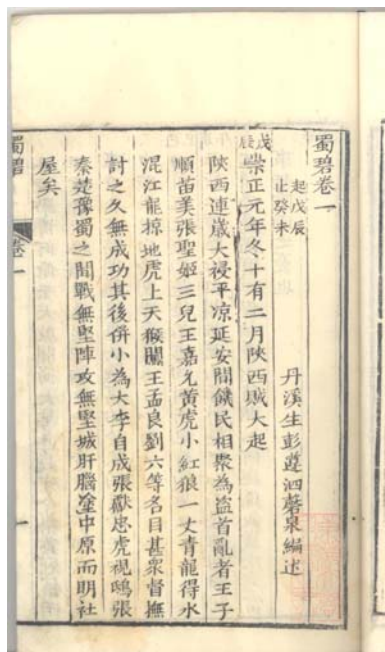
「本衙藏版」《蜀碧》爲嘉慶間刊本考

郭明芳*

《蜀碧》一書作者爲清代彭遵泗，爲一部記明代末葉史料著述。周憲文在編輯《臺灣文獻叢刊》亦將此書視爲南明史料，並收入《叢刊》第 269 種中。今「東海大學圖書館」藏一部「本衙藏版」《蜀碧》，著錄作「清乾隆間(1736-1795)刊本」，前有彭端淑〈序〉¹、〈目錄〉，以及乙丑〈義例總言〉。其版式行款爲每半葉九行、行廿三字，左右雙欄，板框 12.5×18.5 公分；版心上方題「蜀碧」，單魚尾，魚尾下題「卷幾」及葉碼。

是書該館訂爲乾隆間刊本，乃循舊《錄》而來。蓋是書「無任何牌記可資證明」之故。並言：

扉葉僅題「本衙藏板」，〈義例總言〉末僅署「乙丑」，因卷四止於康熙二年，故乙丑可能在康熙二十四年(1685)，然書中「崇禎」作「崇正」，「弘」字缺末筆，「萬曆」作「萬歷」，可能撰於乾隆十年(1745)。然亦未能斷言〈義例總言〉撰寫之年即刊刻之年，在無其它證明之前姑依舊《錄》著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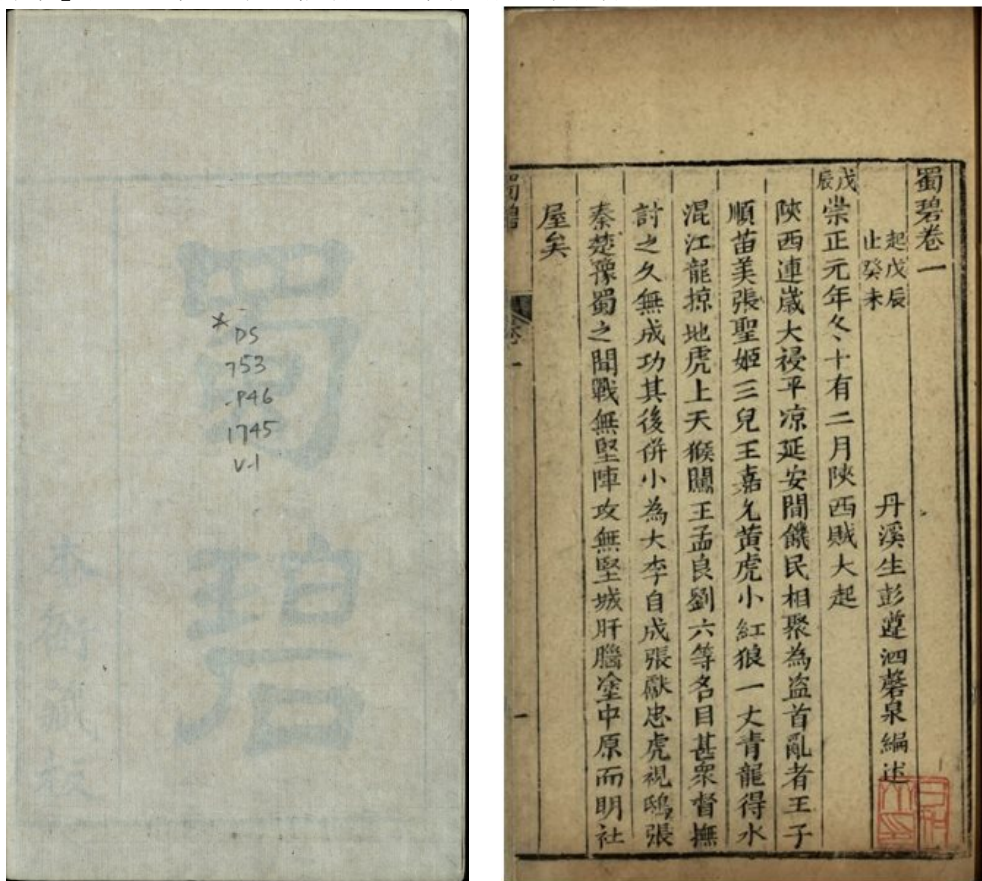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東海本」書影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。

¹ 按，該館《書目新編》作「彭端洲」，蓋字形相近而誤。

這裡從避諱觀點推稱「乙丑」乃乾隆 10(1745)年，有可能是《蜀碧》撰寫年代，是不錯的。而「乙丑」是在乾隆 10 年間，這是可以肯定的。蓋乾隆 42(1777)年「白鶴堂」刊本(此本有中國「吉林大學」、日本「早稻田大學」等館有藏)，其序亦署「乙丑」故也。又因為此本署「本衙藏版」，又無牌記等資訊，於斷定年代或地點更加困難。但我們從字體型態來看，他是坊刻本無疑。查美國「華盛頓大學圖書館」亦有一部乾隆間刊本《蜀碧》，其版式行款與「東海本」同。又從文字版框看，二本約略同時期刷印無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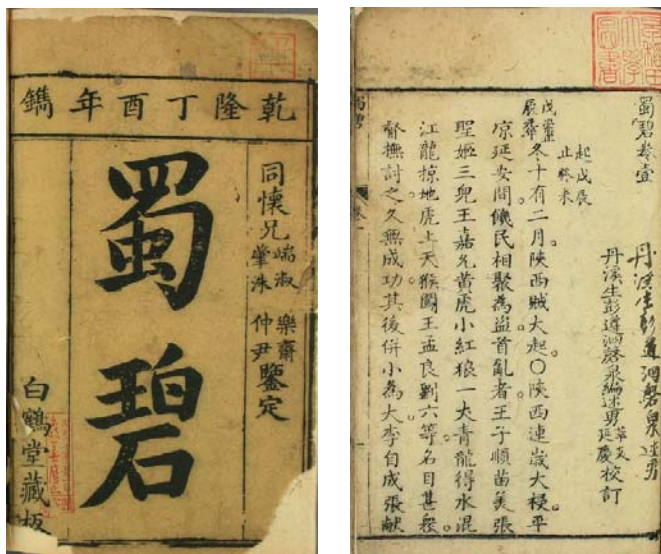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「華大」本扉頁與葉一書影

又美國「國會圖書館」有一部著錄「乾隆 42(1777)年刊本」，因無書影，故未審是否相同。前述之「吉林大學」、日本「早稻田大學」二館皆藏一部乾隆丁酉(42 年，1777)「白鶴堂」刊本，以此本與「東海本」對照後，則有所不同，似可排除「東海本」為乾隆 42(1777)年「白鶴堂」所刊者。此「白鶴堂」本為彭氏家刊本，彭端叔齋名「白鶴堂」。又有一部收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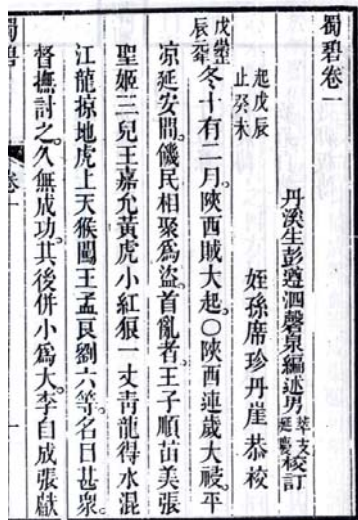
史部冊 126 的《蜀碧》，原藏「浙江圖書館」，此本與「白鶴堂」應該同是彭家所刻，刻印的時間略晚。蓋此本於署名後多「姪孫席珍丹崖恭校」一行。

又查「遼大」有兩部，一部著錄「清坊刻本」，一部著錄「清乾隆刊本」，經與「東海本」比對，可以確定其與「東海本」爲同版所印。另「北大」、「人大」亦各一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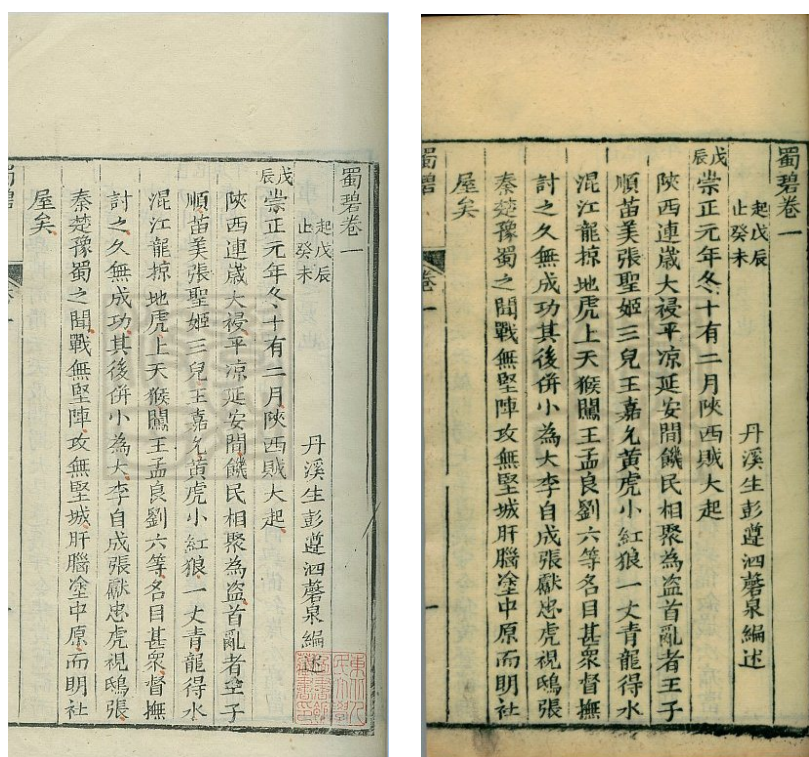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「東海本」確定為坊刻本。其確切刊印時間是否為乾隆間則有待進一步論證。



日本「早稻田大學」藏乾隆 42 年本書影



「浙圖」藏清乾隆本《蜀碧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 126 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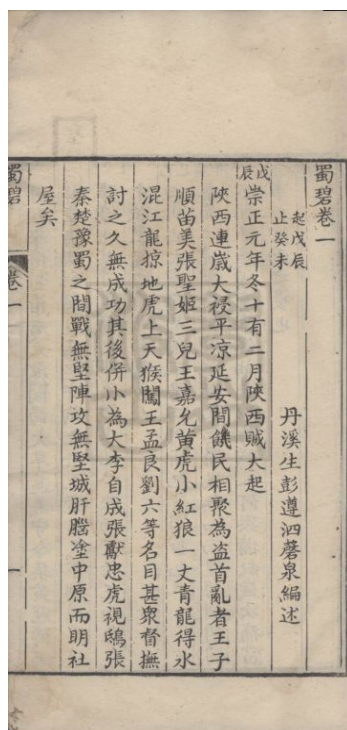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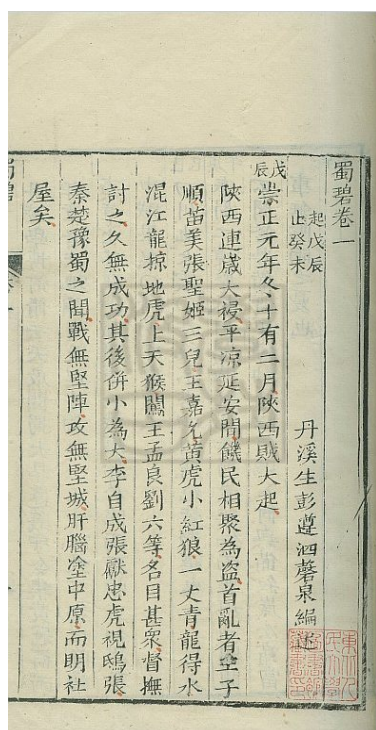


「遼大」坊刊本、乾隆刊本

查找過程中，又知「吉林大學」藏一部**著錄**「嘉慶 20 年天祿閣藏版」《蜀碧》。此本書影經與上述「東海」、「遼大」諸本比對，確為同版所印。然又比對「北大」、「川大」所藏之有「天祿閣」扉頁者，似乎又與「吉大本」有些微不同，筆者將葉一幾個例字製如下表，或可見到這樣差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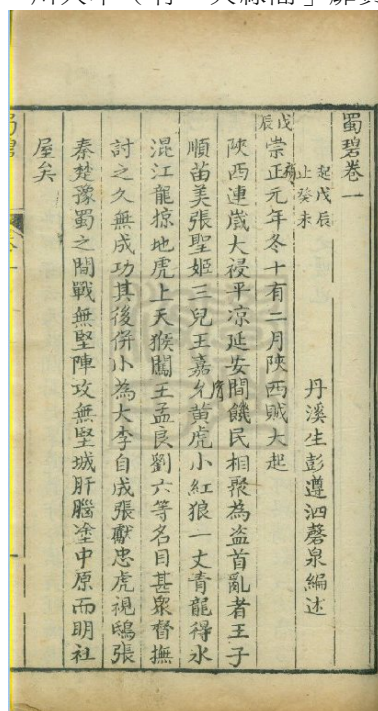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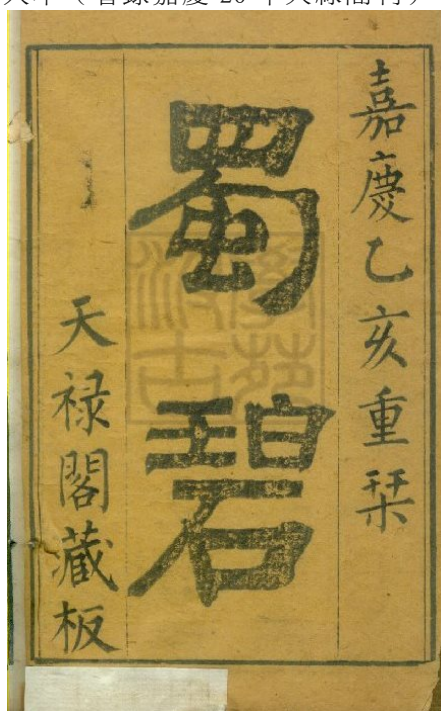
例字位置 (葉一)	吉大本 (著錄 嘉慶 20 年天祿閣本)	北大本 (有天祿閣扉頁)	東海本 (「本衙」本)
行三字一	戊	戊	戊
行三字二	崇	崇	崇
行七字三	之	之	之
行六字五	掠	掠	掠
行七字五	無	無	無
行七字廿三	張	張	張

表一 各本例字對照表



吉大本（著錄嘉慶 20 年天祿閣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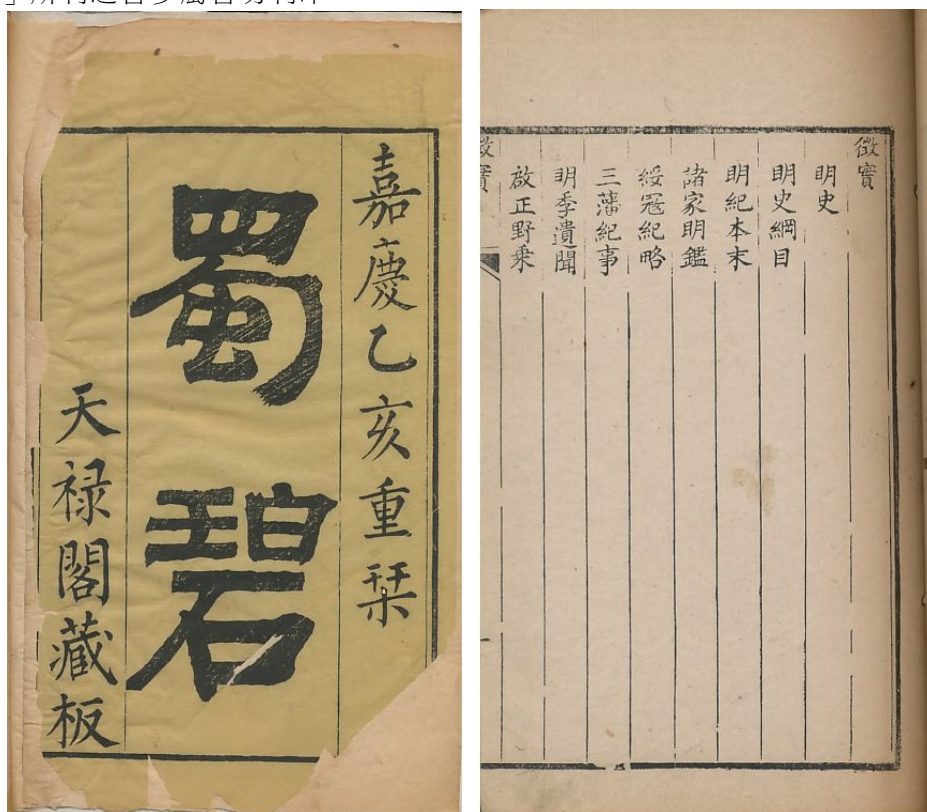
川大本（有「天祿閣」扉頁）



北大藏嘉慶「天祿閣」本

從以上看，「吉大本」字體與「東海本」同，應同一版所印。北大「天祿閣」本字體雖似，但仍存在些微不同，為不同版所印。而「吉大」將所藏「本衙本」類推為「天祿閣本」，極不恰當。因為在沒有任何確切證據下，如此類推則待商榷。當然或許有人認為原版刷印次數過多，模糊漫漶，書坊重新雕版所致。但我們仍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說明「本衙」等同「天祿閣」。或者說，為何初版用「本衙」，後版用「天祿閣」？故筆者認為兩本當看作不同版、不同書坊所刊印。

而兩種既為不同版又不同書坊所刊，要如何解釋？又其刊印時間是否可與「天祿閣」本有關？筆者認為《蜀碧》一書在乾隆間確有刊印，尤其「白鶴堂」刊印屬於作者彭氏所印，有清一代印行版本眾多，或可見其受歡迎程度。書坊見有利可圖加以刊印，這可以說明，名為「本衙」者之原因。蓋「本衙」所刊之書多屬書坊刊印。



「布衣書局」網拍《蜀碧》書影

而兩者先後問題，筆者在未有確切證據下不敢斷言。然從幾個間接證據看，或許可推而得之。首先，筆者前面已比較過兩本字體，發現「本衙本」

字體在整個版面稍大，似較不精細。

其次，從幾個本子序跋來看，「白鶴堂」本前有彭端叔〈序〉、作者〈自序〉、〈義例〉、〈目錄〉，後則有〈附記十五條〉、〈楊展傳〉、〈劉道真傳〉、〈鐵腳版傳〉、〈余飛傳〉、〈書周鼎昌殺賊事〉與〈後敘〉諸篇。「天祿閣」本前有〈彭端叔序〉(隸體字)、〈義例〉、〈徵實〉，後則僅〈附記十五條〉²。「本衙」本前有〈彭端叔序〉(隸體字)、〈義例〉與〈目錄〉，後則後除〈附記十五條〉外，並無其他資料。從以上看來，吾人或許可以假設「天祿閣本」先於「本衙本」。蓋書坊刊印為求低成本高獲利，自然會刪削一些與本文不相關文字，如序跋或附錄，只保留正文即已足。而這與家刊本不同，家刊本為保先人遺澤，儘量附入。圖書有銷路，引其他家書坊重刊者則會再簡化之。這也說明為何「天祿堂本」與「本衙本」正文前後有些差異原因。

第三，從「天祿閣」本扉頁署「嘉慶乙亥重槧」字樣看來，或許前有刊本，今又重槧。這裡的重槧或許指的是乾隆間刊本，應非謂「本衙本」在前。否則無法解釋第一項有關序跋問題。

第四，從避諱來看，則無法從這裡加以判別。筆者既認定「本衙本」晚於「天祿閣本」，則此本當為嘉慶間刊本。但從是書對嘉慶的避諱，卻無法加以判別。嘉慶名「顥琰」，其避諱情形，於張之洞《輜軒語二·敬避字五》有詳論，云：

仁宗睿皇帝廟諱，上一字，《詩》：「顥顥印印」，無恭代之字，敬缺頁旁末兩筆，然「顥若」、「周顥」等字，皆不可用。下一字，《書》：「弘壁琬琰」，無恭代之字，欽奉諭旨，改右下「火」字作「又」，然「琬琰」、「翠琰」等字，皆不可用。單用「炎」字及「談」、「淡」偏旁，音義各別，不得改「炎」作「𤇀」。(《張之洞全集》，頁 9815)

現以所見是書「遇」、「萬」、「燄」諸字皆完筆無缺。惟見卷二葉四 A 第九行「蔣世鉉」，「鉉」字未避康熙諱。或許此本為書坊所刻不謹嚴之故。

因此，此「本衙本」或在晚於「天祿閣本」。

以上只是筆者推論，但可確定的是，「本衙本」當在嘉慶間所刊無疑，蓋因為兩本時間接近，才有竟相仿刻，相互競爭之故。因暢銷而竟起仿刻的例

² 按，此據網路「布衣書局」拍品簡介，網址：
<http://www.booyee.com.cn/user-bid.jsp?id=86765>。

子，筆者可以舉另一時代略近者說明之。乾隆末葉沈啓鳳撰《諧鐸》一書頗為風行，但初刻因影射到當時官員而遭毀版。不久市面上就「本衙」的書坊刊本(據日本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」藏本)，在「本衙本」出現不久又有一修訂過的「藤華榭本」(此本今「臺灣大學圖書館」藏)。筆者從兩者行文有修訂處與「藤華榭本」避諱考訂「藤華榭本」晚於「本衙」本。而這個「本衙本」與「藤華榭本」不同版、不同書坊所刊也是可以確定。「本衙本」《諧鐸》在嘉慶、道光、以迄光緒續有刊印，僅將版面年代改署而已，未見改稱「本衙」為某書坊者。

因此，《蜀碧》一書於乾隆末嘉慶初頗風行，出版者眾。「東海本衙本」與「天祿閣本」當是此風潮下競相出版的證據。「東海本」刊印時間，據「天祿閣」本署「嘉慶 20 年」不遠，故當為嘉慶間書坊刻本，非乾隆間刊本，明矣。

附：乾嘉間《蜀碧》版本源流表

